

新精英集团、制度能力与 国家的军事效仿行为^{*}

左希迎

=内容提要> 在历史上持续出现的社会运动中,以军事效仿为代表的国家学习行为是人类社会演进的重要动力。国家实行军事效仿战略的原因不仅取决于一国在体系中的外部安全压力,也取决于国内的统治压力。军事效仿的规模、速度和程度与一个国家精英集团和国家制度能力的特性密切相关:一国内部新精英集团的力量越大,其军事效仿的规模、速度和程度越大;一国内部国家制度能力越强,其军事效仿的规模、速度和程度越大。因此,就理论和现实来说,国家的军事效仿战略必须有卓越的领导人和强大的国家制度来保证,这是实行军事效仿战略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 军事效仿;外部威胁;新精英集团;制度能力

=作者简介> 左希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邮编:200433)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10)09-0088-21

* 感谢陈志瑞教授、刘丰博士、任晓教授、唐世平教授、信强副教授、吴心伯教授和袁正清研究员对文章提出的修改建议,文章的观点由笔者负责。

国家学习强者,效法先进国家的技术、制度和文化的,这不仅是人类社会理性的体现,也是历史上持续出现的社会运动。德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在总结欧洲各国家和地区兴衰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技术和商业是会从这一个城市移转到另一个城市,从这一个国家移转到另一个国家的。”¹而实现这种国家之间的转移,其核心动力之一就是彼此之间的效仿(emulation)行为。在国际政治中,在军事技术、军事制度和军事理念上效仿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这是一国缓解自身安全压力经常采取的战略。这种国家之间的军事效仿行为也加速了军事创新的扩散,从而成为推动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动力。在学习和效仿他国成功经验的过程中,有些国家取得了成功,有些国家则以失败告终。那么,国家为什么会采取军事效仿的战略?为什么有的国家可以大幅且快速地进行效仿,而其他国家的军事效仿则举步维艰?国内精英集团的选择和国家制度能力对国家军事效仿的作用是什么?重新思考和解答这些问题对理解当今世界的安全形势和军事变迁有着重要意义。

一 对国家军事效仿行为的现有解释

军事效仿意指一个国家学习其他国家先进军事实践(包括军事技术、军事制度和军事理念)的行为。军事效仿与普通的军事改革有所区别,效仿有明确的模仿对象,并且在组织建制和实际做法上有学习强者的明显特征,而普通军事改革则没有明确的学习对象。²在近代历史的大国角逐中,各国无一例外都在相互效仿,以保证国势兴隆。从近代各国效仿法国的义务兵役制和普鲁士的总参谋部制度,到海湾战争后各国效仿美国的先进军事技术、制度和理念,军事效仿一直在国际体系的演进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国家军事效仿行为是学术界长期忽视的一个领域,缺少系统的论述和整理。近年来,随着学术的积累,逐渐出现了一些文章和著作,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做了进一步拓展。对于国家为什么进行军事效仿以及什么因素影响效仿的规模、速度和程度,学术界对此主要有以下几类解释。

(一)现实主义的解释

¹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蔡受百校:《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0页。

² 军事效仿和普通军事改革的区别,感谢刘丰博士在此问题上对笔者的提醒。学习(learning)行为包括学习自身的经验教训和学习他人成功经验两种形式,效仿(emulation)属于学习他人成功经验的学习行为。本文探讨的是一国学习他国的行为,因而国家对历史经验的学习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在外交政策中,关于国家对历史经验教训学习的探讨,可参见 Jack S. Levy / *Learning and Foreign Policy: Sweeping a Conceptual Minefie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8 No 2 1994 pp 279-312。

现实主义的解释始于肯尼思·华尔兹 (Kenneth N. Waltz) 的零散论述。华尔兹强调, 在国际体系中安全资源是匮乏的, 各国处于竞争状态, 国际体系中的竞争促使各国调整自我, 使之成为最强的国家, 外部的安全压力是国家效仿的根本动力。他认为, 各国紧密共存, 一旦某一国家未能遵循成功的实践, 便将使自身处于不利境地, 这一切促进了国家间的趋同。¹ 国际结构通过行为体的社会化 (socialization) 和国家间竞争两种方式约束和塑造国家行为, 彼此竞争的国家会效仿实力最强、最具智慧的国家创造的军事革新。² 竞争压力和社会化的结果是各国之间的趋同效应。³ 也就是说, 军事竞争使得政治实体的类型和组织形式越来越相似。这种政治实体的趋同性一方面表现在不适应竞争的实体逐渐被淘汰的过程上, 也体现在不同实体向先进实体的学习过程上。⁴

在华尔兹研究的基础之上, 有两个学者对这一议程做了进一步拓展。约奥·勒森德-桑托斯 (João Resende-Santos) 沿着华尔兹的思路, 进一步提出了五个核心论点: 军事效仿是对外部威胁做出的安全提升战略; 效仿是制衡行为的一种形式; 国家存在于一个动态和竞争的国际体系; 国家偏好于效仿已经被政治标准证明有效的国家; 军事效仿的时机、速度和程度随着国家外部安全竞争的烈度变化而变化。⁵ 从桑托斯的论述来看, 他基本认同华尔兹的观点, 但在两点内容上有所拓展: 一是阐明了国家的军事效仿行为是内部制衡行为的手段之一; 二是军事效仿的幅度与外部安全环境的烈度成正比。科林·埃尔曼 (Colin Elman) 用美国和苏联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装甲部队发展的案例来检验新现实主义和组织模式的解释, 他认为两个解释模式都只能部分解释这两个案例, 比较来看, 现实主义的解释力更强一些。埃尔曼综合了两个解释模式, 并对其加以修正, 他认为国家如何应对其他国家的军事实践, 主要依赖新的军事实践对应对国的威胁和提供的机遇、国家对新实践掌握的信息质量以及战争的可能性和烈度。⁶

近年来, 活跃的新古典现实主义也在试图解答这一问题。这些学者谋求整合体系

¹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 128.

²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27.

³ 刘丰: 5均势生成机制的类型与变迁, 载《欧洲研究》, 2009年第4期, 第16-17页。

⁴ 朱天鹰: 5比较政治经济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27页。

⁵ 桑托斯的主要论述, 参见 João Resende-Santos, *Neorealism, States and the Modern Mass Ar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João Resende-Santos, / Anarchy and the Emulation of Military Systems: 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Technology in South America, 1870-1930,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3, 1996, pp. 193-260.

⁶ Colin Elman, *The Logic of Emulation: The Diffusion of Military Practic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99.

层次和单元层次的变量,构建一个国际-国内互动的模型。他们认为体系结构是其首要变量,但结构压力通过国内变量来起作用,国内权力关系、战略领导层和利益集团等对国家的军事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¹杰弗里·托利弗(Jeffrey Taliaferro)提出了一个资源提取模型(resource-extraction model)。他认为,国际体系的竞争本质刺激国家效仿领先国家成功的政治、军事和技术实践,或者通过创新回应这些实践。国家能力(state power)能够塑造国家追求的国内制衡战略的形态,并对外部安全压力、国家权力与国家的效仿战略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做出了阐述。即使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安全压力,如果其资源提取能力和动员能力低下,军事效仿行为也是很困难的。²

综合华尔兹、桑托斯、埃尔曼和托利弗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研究路径注重外部威胁对国家军事效仿的根本性推动,强调各国竞争和安全资源稀缺的重要作用。尽管这一解释有其合理性,但是,它首先忽视了国内政治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也就是否认了国家具有自主性(autonomy),忽视了国家能够独立自主决策,并不完全受制于国际体系。其次,这些学者忽视了国家社会结构的作用,也忽视了一些微观的因素,例如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精英集团的变迁等,新古典现实主义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但是仍然没有摆脱以外部威胁作为第一推动的藩篱。最后,新古典现实主义对国际结构和国内因素如何互动、国内因素如何过滤结构压力等问题也没有深入探讨。

(二)组织社会学的解释

组织社会学是从社会学的路径来研究组织、解释组织问题的学科。”组织社会学中的新制度学派旨在探讨为什么现代社会中的组织会越来越类似这一问题。针对社会组织趋同性的问题,有些学者坚持社会学的路径,对这一趋势做出了解释。例如,约翰·迈耶(John W. Meyer)和布莱恩·罗恩(Brian Rowan)从组织和环境的关系出发,解释了美国各地教育制度为何存在趋同性的疑问。³保罗·迪玛乔(Paul J. DiMaggio)和沃尔特·鲍威尔(Walter W. Powell)沿着这一思路,探讨为何不同的组织会采纳相似的组织模式,他们认为组织趋同主要是因为三个动力机制的存在,即强迫性

¹ Tom Dyson /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in Post-Cold War British, French, and German Military R&D Efforts: Between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and Executive Autonomy, *Security Studies*, Vol 17, No 4, 2008, pp 726-727. 对新古典现实主义更详细的介绍,参见 Steven E. Lobell et al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² Jeffrey W. Taliaferro / State Building for Future Wars: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esource-Extraction Model, *Security Studies*, Vol 15, No 3, 2006, pp 464-495.

³ 周雪光:《5组织社会学十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⁴ John W. Meyer and Brian Rowan, /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3, No 2, 1977, pp 340-363.

趋同 (coercive isomorphism)、模仿过程 (mimetic processes) 和规范压力 (normative pressures)。¹ 这些学术努力极大地推动了组织社会学中新制度学派的发展, 确立了解释组织趋同的组织社会学路径。在国际关系学科中, 有些学者坚持组织社会学的研究路径, 他们自我标榜为社会学制度主义, 探讨规范如何在跨国组织内发展, 如何在跨国网络中扩散以及如何塑造国家发展军事实力。

达纳·艾尔 (Dana P. Eyre) 和马克·萨奇曼 (Mark C. Suchman) 认为, 武器扩散并非因为各国在技术能力和国家安全需要之间的竞争, 而是基于国内军队及其装备高度象征性、规范性的本质, 也就是说, 国际文化规范对国家军事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 武器的扩散是由制度化的规范结构所驱使和塑造的, 各国为了合法性, 接受了国际文化规范。他们认为, “并不是军队塑造了现代国家; 相反, 是世界政治和社会体系塑造了现代民族国家, 国家进而建设了现代化的军事力量和获取现代化的武器装备。”⁰ 西奥·法雷尔 (Theo Farrell) 则认为, 世界文化和跨国界的规范能够塑造国家军事力量建设的方式, 其中传统战争的规范给军事组织提供了模板, 人道主义法律的标准定义了军事行动中什么是符合道德的。”这些研究谋求解释行为体在应对威胁时, 如何在“不违背规范、保证其合法性的前提下”变更它们的军事实践。这就需要探究军事组织的内部需求, 探讨这些需求与维持合法性之间的关系。作为组织社会学的研究维度, 这些研究涉及了环境与组织之间如何互动的问题, 也涉及组织如何变化的动力机制。但如何界定规范, 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同时, 对世界文化规范的来源和变化问题, 艾尔和萨奇曼也没有给出很好的回答。⁴

(三) 文化观念的解释

从文化、规范和认同的角度解释国家的军事实践, 往往强调国内的政治文化、国家身份、意识形态和民族传统对借鉴先进军事实践和理念的推动或阻碍。有学者认为, 精英集团的文化宽容是核心变量, 文化和意识形态是否正统会影响扩散和效仿的规模、速度和程度, 扩散、创新和效仿的成功需要精英集团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上开

¹ Paul J. DiMaggio and Walter W. Powell /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8, No 2, 1983, pp 150- 154.

⁰ 达纳·艾尔、马克·萨奇曼: 5身份、规范和常规武器扩散: 一种制度主义的理论方法 6, 载 [美] 彼得·卡赞斯坦主编: 5国家安全的文化: 世界政治中的规范和认同 6,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82页。

» Theo Farrell / Transnational Norms and Military Development: Constructing Ireland. s P rofessiona l A rmy 0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7, No 1, 2001, pp 63- 102. Theo Farrell / World Culture and Military Power 0 *Security Studies*, Vol 14, No 3, 2005, pp 448- 488.

⁴ 宋伟: 5译者前言 6, 载 [美] 彼得·卡赞斯坦主编, 宋伟、刘铁娃译: 5国家安全的文化: 世界政治中的规范和认同 6, 第 14- 15页。

明,更需要在科学、技术和政治知识上开放宽容。¹ 从社会文化的维度来看,军事领域如今已经是检验政治共同体身份的战场。有学者在研究军事人力政策时发现,从国家认同的角度更能解释军队何时采用更为自由的人力政策。² 也有学者针对国家之间为何出现/军事趋同(military isomorphism)现象,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提出了/安全假想(security imaginary)的概念加以解释。”综合以上几个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解释多以文化宽容和规范认同作为核心变量,但这些概念非常模糊、不明确,如何使得核心概念能够明确化、具体化和操作化,这是其必须解决的问题。

(四)外交政策制定的解释

也有学者从外交政策制定的路径,谋求建构一种外交政策模式,以图解释国家的效仿行为。该模式以国家偏好(preferece)为因变量,坚持从国家层次上寻求解释。这一路径认为,大众很少参与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因此对国家的效仿行为影响很小,而精英参与外交政策制定和执行,因而更容易汲取经验教训,学习他国的成功行为。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成功或者失败是其效仿与否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只有遇到自我失败,并且政策选择是多元的时候,外交政策偏好才会发生变化,国家才可能效仿,其因果关系为:失败y 复杂的选择y 选定成功的模型y 模仿y 偏好。³

另外,有些学者则遵从组织过程模式,探讨军事组织对国家安全政策的影响。该模式认为,政策是组织的输出。⁴ 所以,国家的军事实践取决于军事组织如何制定和执行政策,职业军事机构总是在努力推动实现自我的组织使命,寻求最大的自主权和最小的不确定性。⁵ 该模式有两种不同的分析路径:一条侧重分析军事行为体的偏好,另一条关注多个军事行为体之间的授权与争权。⁶ 第一条路径关注的是军事组织如何实

¹ Emily O. Goldman / Cultural Foundations of Military Diffus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2, No 1, 2006, pp 70- 71 对军事技术和观念扩散的论述,还可参见 Emily O. Goldman and Leslie C. Elias, eds, *The Diffusion of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Idea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² Ronald R. Krebs / One Nation under A Flag: Military Participatio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Security Studies*, Vol 14, No 3, 2005, pp 529- 564.

³ Joëlie Pretorius / The Security Imaginary: Explaining Military Isomorphism, *Security Dialogue*, Vol 39, No 1, 2008, pp 99- 120.

⁴ Benjamin E. Goldsmith, *Imit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bservational Learning, Analogies, and Foreign Policy in Russia and Ukrain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p 37- 39.

⁵ Graham T. Allison, / Conceptual Model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3, No 3, 1969, p. 1969.

⁶ Jeffrey W. Legro / Military Culture and Inadvertent Escalation in World War II,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4, 1994, p 114.

⁷ Colin Elman, *The Logic of Emulation: The Diffusion of Military Practic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pp 79- 92.

现组织政策的连续性和自主性,如何实现组织利益的最大化。例如,斯蒂芬·罗森(Stephen Peter Rosen)对军事部门不同偏好对安全政策影响的研究;¹ 江忆恩(A lastair Iain Johnston)对战略文化对国家行为影响的论述。² 第二条路径关注的是各个不同部门之间利益和主张的纷争。例如,有学者关注文官决策者对军队作用的信念和军队的组织文化对国内军事实践的影响;³ 有学者则注重探讨文官对军队的作用。⁴ 但这一分析模式也有其局限:首先,军事组织在更大程度上仅仅是作为一个政策执行部门,因为外交政策事关国家利益和生死存亡,所以一般由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做最后裁决。其次,该模式往往夸大组织偏好和组织文化的影响。⁵ 最后,军事决策是诸多组织部门综合博弈的结果,国家作为一个利益繁集团多的政治系统,仅仅分析其军事组织并不能窥得全貌。

二 新精英集团、制度能力与军事效仿

军事效仿是国际体系中国家之间竞争互动的一种形式,国家为何效仿、如何效仿以及效仿程度为何不一?其原因复杂多样,这就要求我们在建构理论时简化解释模式,剔除一些因素。那么,国家效仿的产生机制和因果关系是什么?国内精英和国家制度如何影响军事效仿行为?根据文献综述我们可以得知,研究路径的不同造成了各种观点之间的分野。本文将从国内政治的研究路径出发,以解释国家军事效仿的差异性。国际体系的外部压力如何在国家层面发挥作用?从精英集团和国家制度的层面寻求答案是一条可以尝试的研究路径。这是因为,国际压力如何作用于一个国家,这既取决于该国内部精英集团如何做出反应,也取决于国家制度如何约束这些反应。

¹ Stephen Peter Rosen, *Winning the Next War: Innovation and the Modern Milita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² A 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e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³ Elizabeth Kier, / Culture and Military Doctrine: France between the Wars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4, 1995, pp. 65- 93. 更详细系统的论述,可参见 Elizabeth Kier, *Imagining War: French and British Military Doctrine between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方便归类,本文把组织文化的解释放在组织过程模式中。

⁴ Bany R. Posen, *The Source of Military Doctrine: France, Britain, and Germany Between Wa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Jacky Snyder,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Disasters of 1914*,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Deborah D. Avant, / The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 Hegemons in Peripheral Wars //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7, No 4, 1993, pp. 409- 430.

⁵ Douglas Porch, / Military - Culture, and the Fall of France in 1940: A Review Essay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4, 2000, p. 169.

(一)精英集团与军事效仿

自古以来,一切政治都是精英政治。正如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指出的,“政治研究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¹ 在一个政治体系中身处高位的、居于金字塔顶端的精英人物总是相对少数的,但其在价值分配中却获益最多。现代精英主义理论关注的是社会组织中的精英集团对社会结构和现代民主政治的影响。对这些精英主义者来说,任何社会和组织必然分为精英和普通民众,政治就是少数精英分子的统治。² 在社会和政治组织中的精英,在民主程序中总会代表一定普通民众的利益,以获取他们的支持,但“任何精英都以共同命运的象征作为旗号来为自己辩护和维护自己的利益。”³ 所以他们会努力维护组织的利益,推动有利于自我的政策。

外交政策作为国家政策的一种,主要由精英集团制定和执行。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领导人的六种特征影响到外交政策的偏好。⁴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尽管公共外交逐渐兴起,但是外交政策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由少数政治精英控制。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国家权力和财富控制在极少数人手中,外交政策也由少数政府官员和军方领导人控制,特别是他们在安全政策领域,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作用不容小觑。精英主导、集团控制成为美国政治的典型特色,也成为美国行为的根源之一。⁵ 精英集团如何作用于外交政策的制定,特别是国内政治精英和军事部门的精英如何互动,共同影响国家的安全政策,这需要学术界进一步深入探讨。

一国是否会进行军事效仿,这是国家安全战略层面上的抉择,大多由国家最高领导层决定。一个国家的军事效仿事关国家的战略走向和安全利益,其决策者只能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但是军事效仿的推动者一般有两类:一是军事部门的领导者,二是国家政策的决策者。在现实中,军事决策往往来自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共同推动,

¹ [美]哈罗德·拉斯韦尔著,杨昌裕译:《5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页。

² 其中的一些文献,可参见[意]加塔诺·莫斯卡著,贾鹤鹏译:《5统治阶级》,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意]维尔弗雷多·帕累托著,刘北成译:《5精英的兴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德]罗伯特·米歇尔斯著,任军锋等译:《5寡头统治的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美]约瑟夫·熊彼特著,吴良健译:《5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美]查尔斯·赖特·米尔斯著,王崑、许荣译:《5权力精英》,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美]托马斯·戴伊、哈蒙·齐格勒著,孙占平等译:《5民主的嘲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美]威廉·多姆霍夫著,吕鹏、闻翔译:《5谁统治美国:权力、政治和社会变迁》(第五版),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

³ [美]哈罗德·拉斯韦尔:《5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第19页。

⁴ Margaret G Hemann, / Explaining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Using th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Leaders 0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4 No 1, 1980 pp 7- 46.

⁵ 张宇燕、高程:《5精英主导、集团政治与美国行为》,载《5国际经济评论》,2007年第6期,第12-17页。

这其中包含着繁杂的利益关系。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任何一项社会运动和政治改革背后都隐藏着复杂多变的因果关系,精英集团支持或者反对效仿的动机更是复杂多样,国家的军事效仿战略同样如此。基于此,本文提出的第一个命题是:一国是否采纳军事效仿的战略,不仅取决于外部安全压力,而且也取决于内部统治的压力,面对外部压力和内部危机,精英集团的选择决定了国家是否效仿、如何效仿。也就是说,在一定的安全压力和内部统治危机下,如果一国国内精英集团意识到威胁,并推动军事效仿战略,国家才会执行效仿的战略。

精英集团还可以影响到国家军事效仿的规模、速度和程度,因此,我们可以提出第二个命题:新精英集团的实力与军事效仿的规模、速度和程度成正比,新精英集团的实力越强,效仿的规模、速度和程度越大;反之亦然。军事效仿意味着一个国家将扬弃原有的军事技术、军事制度和军事理念。由于国内精英集团并非铁板一块,利益、观念、地位的不同造成了立场的不同,精英集团往往分裂为支持效仿先进军事技术、制度和理念的新精英与反对效仿的旧精英。一国军事改革的过程就是本国墨守成规的旧精英集团向勇于革新的新精英集团转换的过程。有学者在研究现代化时指出,政治现代化的领袖有原来执政的领导者和对传统领袖不满的精英两个基本来源。¹ 前者的改革往往摧毁原来领导者自身的基础,往往最终难以维持,后一种改革则比较彻底。具体来说,新精英的力量影响军事效仿的效果主要取决于新精英和旧精英的力量对比与新精英之间的凝聚力 (cohesion)。

第一,新精英与旧精英的力量对比与军事效仿行为。有学者指出,国家的学习行为经常被情绪和权力的变数阻塞或者扭曲。² 旧精英往往缺乏进取精神,缺乏积极的勇气。维尔弗雷多·帕累托 (Vilfredo Pareto) 在探讨旧精英和新精英之间的对比时指出,“新精英充满活力和朝气,旧精英则疲惫不堪。”³ 作为原有利益的维护者,旧精英势必会阻碍国家军事效仿的战略。新精英的主导地位不仅仅体现在新精英数量上的优势,更体现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新精英如果谋求推动国家效法先进国家的军事实践,就必须在总体力量上压倒旧精英,控制国家政权,排除旧精英的阻碍。从历史上来看,新旧精英力量之间的对比对军事效仿结果的影响非常明显。例如,晚清中国的洋务运动主要由地方督抚推动,新精英与旧精英对比处于劣势,执行军事效仿的政

¹ [美] C# E# 布莱克著,景跃进、张静译:《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7-58 页。

² Joseph S. Nye Jr., "Nuclear Learning and U. S. - Soviet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1, No. 3, 1987, p. 379.

³ [意]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精英的兴衰》,第 69 页。

策步履维艰;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其新精英占据了绝对优势,军事效仿政策执行的阻力较小。

第二,新精英凝聚力与军事效仿行为。在国内政治中,必然存在权力和利益的斗争,加之价值观念、信息掌握、个人秉性等的不同,精英在维护国家利益、执行国家战略决策的时候也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新精英凝聚力关注的是政府内部新精英集团被派别分割的程度。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新精英的组织化程度。精英集团内部存在利益和观念冲突在所难免,但如果精英的组织化程度很高,则有助于提升精英凝聚力。在现代国家中,精英的组织化主要通过政党来实现。如果一国内部的新精英能够通过特定的制度形式有力地组织起来,则可以加强推动军事效仿的能力。其二,新精英的价值观念冲突程度。如果新精英内部的价值冲突难以控制,则直接造成新精英集团的内耗,其结果是阻碍推动国家军事效仿的战略,加之旧精英集团的阻碍作用,效仿则很难取得成效。

(二)国家制度能力与军事效仿

在国际政治领域,从国内政治制度来研究外交政策的路径是自古有之。国家制度的作用在于它可以汇总国际体系的信息和国内政治的要求,在制度层面进行整合,制定相应的外交政策。同时,国家制度能够塑造国内的社会结构,引导国家的走向。国家制度是国际体系和国内社会信息汇集和处理的中枢,在国家外交政策制定和执行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国家的军事效仿战略也会受到国家制度的束缚。因此,国家的学习行为不仅需要个人的努力,更需要国家提供制度基础和文化氛围。²从世界近代史来看,军事效仿的关键在于建立与最新军事技术、军事制度、军事理念相容的国家制度。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制度越先进,军事效仿效果就越显著。国家制度若要发挥有效作用,其必须建立在特定的社会结构和历史基础之上。由此可以提出本文的第三个命题:国家制度能力(institution capacity)与军事效仿战略的程度成正比。制度能力意指制度对国家的治理和服务能力,它包含两个部分的内容:在横向上是制度的规范能力,在纵向上则是制度的汲取能力。”

制度的规范能力越强,国家军事效仿战略的效果越明显,这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良好的制度能够塑造稳定的国内秩序,这关系到它能否为国家的军事效仿战

¹ 对于精英凝聚力的探讨,参见 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54-56.

² 唐世平:《5国家的学习能力和中国的赶超战略》,载《5战略与管理》,2005年第5期,第43-44页。

» 有学者认为制度能力是国家的核心能力,内容包括制度选择、制度实施、制度监督、制度裁决的能力,参见董海军:《5转轨与国家制度能力研究:一种博弈论的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略提供外部保障。从根本上来说,国家制度的研究就是关注制度如何塑造秩序。良好的制度规范能够确保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繁多的部门运转能够维持最佳状态,以服务于国家的军事效仿战略。其次,良好的制度可以促进国家发展,为军事效仿提供经济基础。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国家弱化的问题核心是国家制度能力问题,因此需要从制度的供给入手,研究哪些制度对经济发展重要。¹对于何种制度促经济发展,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作为制度基础的财产权利结构对国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有学者认为,保证清晰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利的政府是国家发展繁荣的关键。²加之旧制度主义对法律的强调,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强调法律还是强调产权,良好的制度对于一国的国家兴盛至关重要。再次,军民关系(civil-military relations)会影响军事效仿的连续性。军队建设对一国的国家建设、国家认同整合有着重要的作用。³国家采取何种军事战略,军事部门和国家最高决策层的作用都不可忽视。/只要存在着国家,存在着由于社会分化带来的政治角色及政治目标的分离,就存在着军人干政的可能性。⁴军政府在其中的地位特殊,尽管具有较强的国家强制力,但是军政府/强大的暴力机器也不足以证明政治权力或者政治力量的同等强大。⁵由于军政府大多通过政变上台,缺少政治连续性,因而即使采取军事效仿战略,也往往缺少长久的国家支持。所以,文官部门和军事部门的职责必须以制度的形式加以明确,这样才能兼顾效率和连续性的体制,保证军事效仿免受干扰。最后,良好的制度规范能力有利于军事组织重组的成功。军事组织不仅仅是具体的军事组织,它还与广泛的社会模式和实践交互作用。⁶军事组织的重组需要国家制度提供强大的支持。

制度汲取能力越强,国家军事效仿战略的效果也会越明显。/国家汲取能力是指政府从社会获取财政资源的渗透能力,它是国家制度建设的首要任务。⁷制度汲取能力对军事效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强大的制度汲取能力能够为国家

¹ [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许铭原译:《国家建构: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² [美]曼瑟·奥尔森著,苏长和、嵇飞译:《权力与繁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³ Constantine P. Danopoulos et al., ed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Nation-building and National Identit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2004

⁴ 陈明明:《所有的子弹都有归宿:发展中国家军人政治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⁵ [美]罗伯特·杰克曼著,欧阳景根译:《不需要暴力的权力:民族国家的政治能力》,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⁶ Jeremy Black, *Military Organisations and Military Chang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62, No 4, 1998, pp. 871- 872

⁷ 王绍光:《国家汲取能力的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经验》,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77页。

的军事效仿战略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证。在一些学者看来,忠诚且有技能的官员与丰厚的财政资源是国家有效追求各类目标的基础。¹也有学者认为,如果国家缺少或者维持很低的汲取和动员,同时面临着严峻的安全威胁,国家将很难实施效仿的战略。²晚清时期,中国国民财富在世界仍位居前列,但由于汲取能力很弱,政府的收入从来没有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所以国家权力一直比较弱。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强大的制度汲取能力为其提供充沛的物质支持,军事效仿很难顺利运转。其二,汲取能力强同时意味着政策贯彻能力强。制度的汲取能力关系到一个国家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强国家(strong state)往往在配置资源、贯彻国家外交政策等方面的能力比较强。⁴甚至有学者认为,国家的兴衰受到国家资源提取和配置的重要影响。⁵但是,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必须适当处理,过度集权和过度分权都对国家的发展不利。⁶国家汲取财政资源一般通过征税来实现,强有力的税收制度和财政制度必然促使国家制度和社会高度组织起来,从而形成了现代社会强有力的制度机器,而一个国家如若启动军事效仿的战略,没有这些制度的支撑是难以维持的。

(三)精英与国家制度能力

国家的军事效仿战略,不仅需要精英集团团结一致,对外部威胁做出评估,并对新问题和新情况迅速做出反应,制定相应的对策,而且还必须同时调整国家制度,以适应新的军事制度和理念,为军事效仿的全面开展提供制度基础。根据上文的分析,精英集团和国家制度能力制约和塑造一国军事效仿的战略,在安全压力相近的情势下,由于每个国家的制度能力和新精英集团力量强弱不一,所以其军事效仿的成效也会有所

¹ 西达#斯考克波:5找回国家:当前研究的战略分析6,载[美]彼得#埃文斯等编,方力维等译:5找回国家6,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1页。

² Jeffrey W. Taliaferro / State Building for Future Wars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esource- Extractive State 0 p 467

³ Dwight H. Perkins / Government as an Obstacle to Industrialization: The Case of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0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7, No 4 1967, pp. 478- 492. 转引自王绍光:5国家汲取能力的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经验6,载5中国社会科学6,2002年第1期,第78页。

⁴ 通过探讨国家强弱来研究国家行为的一些文献可参见 Thomas J.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 195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Aaron L. Friedberg In the Shadow of the Garrison State: America's Anti- Statism and Its Cold War Grand Strate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⁵ Marc V. Simon and Harvey Starr / Extraction Allocation and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States A Simulation Analysis of Two- Level Security Management 0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0 No 2 1996 pp 272- 297

⁶ 对集权分权对国家兴衰影响的探讨,参见薄贵利:5集权分权与国家兴衰6,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不同,具体来说有四种状况(见表 1)。新精英集团的力量和国家制度能力都有很大的独立性,并不完全取决于彼此,它们互相塑造的能力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但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两者对军事效仿的影响,还有必要探讨精英集团与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厘清精英如何影响国家制度与国家制度如何塑造新精英,以便对这两个变量进行控制。那么,国家制度如何影响精英呢?

表 1 国家制度能力与新精英力量对军事效仿的影响

军事效仿的程度	国家制度能力强	国家制度能力弱
新精英力量强	很强	较强
新精英力量弱	较强	很弱

一方面,国家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精英实现目标的能力。制度一旦形成,就会千方百计维持自我的存在。有学者就指出,军事变革可能被组织程序干扰、阻滞或延时,从而减少个体运用知识和分析完成任务的能力。¹也就是说,在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国家制度中,新精英个体或者集团的行为不是随意而为的。制度的特征就是必须对个人行为产生影响。²如果制度设计合理,则会激发新精英的创造力,有力促进军事效仿的进程。

另一方面,国家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新精英。制度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和选择,以服务于组织的使命。也就是说,必须有一种制度性的存储和程序来影响组织中的新旧成员。”具体到军事效仿的过程,国家制度必须以培养一批支持这一行为的精英为己任。精英对制度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制度的运转必须依靠精英的支撑。国家实施军事效仿战略,新精英重新建构军事制度,同时开展国家制度能力建设,集中建设公共行政体系。³而旧精英则极力维护旧制度的生存,反对新制度的建立,以维持原有的地位和利益。由此观之,国家制度和精英集团之间是相互

¹ Mark D. Mandel,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Past and Present: Historic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 Westport: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7, p. 13.

² [美]盖伊·比特斯:《5制度主义:新与旧》,载薛晓源、陈家刚主编:《5全球化与新制度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6页。

³ Joseph S. Nye, Jr., *Nuclear Learning and U.S. - Soviet Security Regimes*, p. 381.

⁴ 福山认为,在制度能力的各要素中,公共行政最易于系统化和移植,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5国家建构: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第81页。

作用、彼此塑造的关系,两者相互影响的同时,也影响着国家的军事效仿战略。¹

根据这两个变量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上,在国家重建的各种战略中,以军事效仿推动国家制度变革的努力效果不佳,而以国家改革塑造军事的努力效果相对明显,这从法国在普法战争后的国家重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重建、中国的洋务运动、日本的明治维新等历史事件中都能得到验证。在成功的军事效仿实践中,往往是由一些充满了进取精神的官僚精英控制国家政治体系,并且摧毁或重组以往的社会统治集团,重新建构国家制度。国家政治系统作为一个复杂的体系,单一部门的变革往往很难相容于原有的制度体系,所以大多夭折。而具有革命性的政治体系变革则可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这种革命性的变革可能是通过暴力手段实现,也可能是通过主导精英有规划的改革实现。

三 案例研究:19世纪前期奥斯曼土耳其和普鲁士的比较

本部分将以奥斯曼土耳其和普鲁士为案例,具体分析精英集团和国家制度能力对军事效仿行为的影响,以验证本文的观点。之所以选择这一案例,笔者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可比性,奥斯曼土耳其和普鲁士两国在拿破仑战争之后都有显著的军事效仿行为,并且其历史时期相近,同样受到法国大革命中军事革新的冲击,符合本文的研究问题。二是可检验性,由于普鲁士的效仿效果很明显,在三次统一战争之后,其军事模式冲击了整个世界,成为各国争相效法的榜样,而奥斯曼土耳其则国势衰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完全瓦解。

(一)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冲击

法国大革命作为影响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引起了欧洲国际关系的巨大变迁。²一方面,法国大革命秉持自由、民主、博爱的旗帜,以建立民主政府为己任,冲击着旧欧洲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法国军事实践的成功冲击着欧洲各国原有的军事组织和军事理念,正如七年战争对法国军事实践的冲击一样,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迫使各国

¹ 兰德尔#施维勒认为,精英共识和精英凝聚力决定了国家的意愿,只有社会凝聚力和政权脆弱性决定国家行动的能力,参见 Randall L. Schwelker *Unanswered Threats: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p. 47.

² 详细的探讨,可参见 Paul W.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 - 184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进行军事改革。¹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对世界军事实践的冲击主要体现在战争方式、军事组织和民族主义三个方面。

首先,战争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从腓特烈大帝到拿破仑,战争的指挥艺术逐渐进步,冲击着原有的战争方式。² 拿破仑花费了四年多的时间改组军队,重新审查和改进他的作战体系,精心制定战略原则和战术原则。”在拿破仑战争中,火炮的作用日益凸显,机动性高的骑兵也成为各国倚重的重要兵种。³ 与此同时,军事技术的进步也飞速前进,新的武器装备不断出现,这使得战争在微观层次上的方式、范围和强度等方面也有所变化。

其次,法国军事组织创新,兵役制出现重大变革。法国大革命以前,欧洲国家军队中的军官由贵族担任,军队与社会隔绝。法国大革命中,由于持续的外部压力和内部政治改革使然,军事组织也发生了重大的变迁,预备役制度开始形成,志愿兵制度也逐渐建立,普遍征兵制开始创设。⁴ 从根本上,以往战争和军事事务仅仅是国王或者政府的私事,与普通民众关系不大,法国大革命以后,则成为与普通民众密切相关的事务。军队内的平等为军人发挥个人才干提供了充分的机会,由此重塑了军事组织与国家、政府、公民之间的关系。

最后,民族主义兴起,冲击着国家的组织形式。拿破仑战争唤醒了欧洲人民的民族认同,民族主义的兴起成为近代民族国家体系形成和成熟的重要标志。民族主义的出现,加剧了各国之间竞争和战争的烈度,增强了各国动员资源和兵源的能力,改变了国家动员的制度体系。⁵ 民族主义从而成为国家增强自身实力、赢得战争的利器。

(二)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军事效仿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崛起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作为一个地跨亚、欧、非三

¹ 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对欧洲军事实践影响的探讨,参见 Hart Liddell *The Ghost of Napole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3; Alexander Grab *Napole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² 具体论述参见 Claus Tepp, *The Evolution of Operational Art, 1749 - 1813: From Frederick the Great to Napoleon*, London and New York: Frank Cass, 2005, chapter 2.

³ [法] 乔治·勒费弗尔著,河北师大外语系5拿破仑时代6翻译组译,端木正校:5拿破仑时代6,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97页。

⁴ 对骑兵在拿破仑战争中作用的介绍,参见 Digby Smith *Charge of Great Cavalry Charges of the Napoleonic Wars*, London: Greenhill Books, 2003.

⁵ 具体论述参见 Thomas Hippler, *Citizen Soldiers and National Armies: Military Service in France and Germany, 1789 - 1830*,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chapter 3.

⁶ 对此的精彩分析,参见 Barry R. Posen, / Nationalism, the Mass Army and Military Power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2, 1993, pp 80-124.

大洲的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自崛起之时就与欧洲有着复杂的关系。然而,近代以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逐渐衰落而陷入危机,不断受到西方大国的侵略与打压,唯靠效法以追赶西方。早在18世纪,随着国际局势的变迁和其国势日益式微,奥斯曼帝国谋求加强中央集权,进行军事效仿,但是未能扭转颓势。¹ 19世纪前后,对风雨飘摇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来说,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平等、政教分离和民族独立等理念对它的冲击尤为强烈。在外部安全上,1783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1787年土耳其对俄奥战争爆发、1789年法国军队在亚历山大港登陆以及随后侵占埃及和巴勒斯坦地区等事件使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面临着严峻的威胁。在内部统治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军官穆罕默德·阿里 (Muhammad Ali) 在1905年攫取了权力,控制了埃及,并从事独立运动。² 加之塞尔维亚人的叛变、希腊的独立运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陷入了空前的危机。

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奥斯曼帝国被迫进行军事效仿,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制度。1789-1807年,新苏丹塞利姆三世 (Selim III) 趁着欧洲慌乱的时机,大刀阔斧地对军队进行革新。这些改革以法国为蓝本,依仗法国政府的帮助,聘请法国的教官和老师。尽管由于在1798-1802年的法土战争中两国兵戎相见而中断,但是随后恢复并增强。在军事上,学习法国的军事技术、军事训练技巧和组织形式,建立新式军队和新式学校,在军队中推行/新秩序 (Nizam-ı Cedid), 谋求根除旧军队中的裙带政治、贪污腐败和低能低效。³ 在海军建设上,塞利姆三世重建了对俄奥战争中被摧毁的海军,学习西方国家的舰艇制造技术,并勇于创新。⁴ 在政治上,效仿欧洲设立外交部等机构,建立邮政制度,颁布总督官制和财政税收的新制度,设立财政局,强制对特定商品收税以筹措经费。⁵ 但是由于改革损害了总法典官和近卫兵团的利益,激起了顽固派的反对和叛乱。塞利姆三世于1807年退位,随后新军被解散,奥斯曼帝国的军事效仿夭折。

塞利姆三世退位以后,奥斯曼帝国经历了几次反复,但是推动改革的力量却更加成熟。奥斯曼苏丹迈哈默德二世 (Mahmut II) 着手恢复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取消

¹ 对18世纪奥斯曼帝国军事改革的介绍可参见 Avigdor Levy / Military Reform and Problem of Centralization in the Ottoman Empi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18, No 3, 1982, pp 227-249.

² Donald Quataert, *The Ottoman Empire 1700 - 192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55.

³ 具体的论述参见 Stanford J. Shaw, / The Origins of Ottoman Military Reform: The Nizam-ı Cedid Army of Sultan Selim III,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37, No 3, 1965, pp 291-306.

⁴ 对塞利姆三世时期海军建设的介绍可参见 Tuncay Zorlu, *Innovation and Empire in Turkey: Sultan Selim III and the Modernisation of the Ottoman Navy*, London and New York: Tauris Academic Studies, 2008.

⁵ [英]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5页。

各地特权。1826年,迈哈默德二世颁布成立新军的诏书,但仍然保留近卫兵团,实际上恢复了塞利姆三世的/新秩序0,这得到了总法典官和一些近卫兵团中的某些高级军官的支持,但此举引起了近卫兵的强烈反弹,并引发了兵变,迈哈默德二世镇压了兵变,并宣布解散近卫兵团,扫清了改革的最大障碍,于是苏丹重新开启了军事效仿的序幕。¹迈哈默德二世在军事上制定了建立新军的组织条例,获得英国和普鲁士的帮助,组织新式军队,设立军事学校,选派留学生,培养新式军官。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谋求使苏丹权力成为帝国的唯一权力来源。同时加强政府机构改革,把总法典官等旧政治势力整合进政府,加强官僚的改革和现代化,以此推动国内社会的现代化。²加强文官建设和外交系统改革,废除地方的封建采邑制,为军事效仿创造条件。在社会文化方面,进行语言、服饰、交通等方面的改革,全面冲击帝国的旧有力量。到1839年,迈哈默德二世逝世,继任的苏丹继续执行迈哈默德二世的改革措施,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得以继续推进。但由于帝国内部阻力重重,军事效仿步履蹒跚,军事效仿的成效仍然无法阻止帝国国势衰颓的趋势,奥斯曼帝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也无法自我保全。

(三)普鲁士的军事效仿行为

19世纪初期,普鲁士军队在拿破仑战争中一败涂地,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加之国内问题丛生,普鲁士的统治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然而,面临这些危机,普鲁士统治者深知最大的威胁不仅来自法国,而且来自国内下层的革命运动,是故师学法国,全面推动政治、军事和社会改革,并且进行了诸多比法国更彻底的创新。”

在格尔哈德·冯·沙恩霍斯特(Gerhard van Scharnhorst)、奥古斯特·奈哈特·冯·格罗森瑙(August Neidhardt von Gneisenau)、卡尔·冯·施泰因(Karl von Stein)、卡尔·冯·哈登伯格(Karl von Hardenberg)和卡尔·冯·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等人的推动下,普鲁士的政治军事改革逐渐深入开展。1807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III)授命沙恩霍斯特进行军事改革,并主持军事改组委员会,施泰因则被任命为国务大臣。军事改组委员会次年颁布法令,专业才能从此成为军中唯一的标准。³这一改革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废弃了原先等级社会的军事制度,军官全面向中产阶级开放,因而年轻的军官更乐意支持改革以获得提升。沙恩

¹ 对迈哈默德二世改革的介绍,参见[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四章。

² Walter F. Weker / *The Ottoman Bureaucracy: Modernization and Reform*,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 13, No 3, 1968, pp 451-470

³ Brendan Simms *The Impact of Napoleon: Prussian High Politic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risis of the Executive 1797-180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⁴ David Blackbour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A History of Germany, 1780-191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86

霍斯特认为,将来的/军事内部重建0不应该仅仅是技术和战术上的,他还希望新军队要实现既定的意图,并且与公民达成一个更密切、更深入的联盟。¹

1814年,普鲁士效仿法国,建立了普遍征兵制,并在同年通过了一个法令,规定所有的普鲁士人有义务在军队中服役五年,包括三年现役和两年后备役。²这项改革虽然没有系统充分地实施,但这是对军官职业化的重大变革,并为其他国家所效法。同时普鲁士还改革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制度,为选拔军官服务。/改革打破了原来带有贵族色彩的军事教育体制,对全民开放,扩大了受训人员的范围和数量。0³随着正规军事教育课程和专业学校的建立,军队内的提升和任命开始主要依赖于能力和战功。⁴到1819年,军队中的贵族军官所占比例已经从原先的90%下降到50%多一点,改革初见成效。⁵军事教育体制的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教育训练的内容和方式,也改变了军事组织的结构和功能。

普鲁士不仅在兵役制度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还进行了统帅制度的创新,创立了总参谋部制度(General Staff)。普军作战指挥系统在拿破仑战争中的糟糕表现使得普鲁士意识到统帅制度的混乱,于是沙恩霍斯特组建了现代意义上的总参谋部。沙恩霍斯特组建了战争部,总揽战争事宜。战争部下设两个分部:一个是负责行政问题的军事经济部;另一个是综合战争部,其下辖三个处:第一个处接替原有军事内阁的功能,负责联系行政部门;第二个处形成了总参谋部,作为军队和军校高等军官的智力中枢,负责训练和指挥军队;第三个处专管军需检查管理。⁶总参谋部作为一种杰出的军事制度在随后的战争中一战成名,影响了世界军事历史的进程,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由于普鲁士的军事改革比较彻底,所以成效非常显著。经过三次王朝统一战争,普鲁士不仅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还一举成为欧洲大陆实力最强的国家。德国的军事体制逐渐被其他国家广为效仿,成为后起国家实现富强的楷模。德意志因为其公立学

¹ Ute Frevert, *A Nation in Barracks: Conscription, Military Service and Civil Society in Modern Germany*, Translated by Andrew Borham, Oxford and New York: Berg Publishers, 2004, p. 11.

²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赵力涛译:《5民族 - 国家与暴力6》,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76页。

³ 刘英、杨洁:《5普鲁士军事变革及启示6》,载《5军事历史6》,2006年第12期,第42页。

⁴ Everett Carl Dolan, *The Warrior State: How Military Organization Structures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 132.

⁵ David Blackbour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A History of Germany, 1780 - 1918*, p. 87.

⁶ Walter Goerlitz, *History of the German General Staff, 1657 - 1945*, Translated by Brian Battershaw,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53, chapter 2. Peter Hofschreier, *Prussian Staff & Specialist Troops 1791 - 1815* (Mentor Books 381), Oxford: Osprey Publishing, 2003.

校和总参谋部被欧洲国家大为艳羡, 在教育和军事上俨然成了欧洲的导师。¹

(四) 两国的比较分析

回顾 19 世纪上半期的历史, 我们可以发现, 拿破仑战争以前, 奥斯曼和普鲁士两国都曾受到法国的入侵, 国家安全无法保证, 但是在拿破仑战争以后, 普鲁士的安全局势得到缓解, 而奥斯曼土耳其则更加严峻。基于军事效仿的原因, 奥斯曼和普鲁士两国基本相同, 都是同时面临外部安全压力和国内统治危机, 但通过上文的梳理, 我们发现, 普鲁士军事效仿的规模、速度和幅度明显强于奥斯曼。普鲁士的军事效仿为何更为彻底? 这有着深刻的国内政治背景, 需要我们对两国进行比较分析。

在精英集团上, 奥斯曼帝国内部的精英对是否进行军事效仿纷争很大, 新精英对旧精英的力量对比也不占优势, 新精英集团的凝聚力也不强。具体来说, 在塞利姆三世和迈哈默德二世的军事改革中, 他们都面临着缺少新式军官和新精英的困境, 所以国家领导人重视教育工作, 注重对新式精英的培养。在塞利姆三世改革的过程中, 奥斯曼帝国内部精英集团形成了三派: 保守派想重新采用奥斯曼黄金时代的策略来恢复军事荣誉; 浪漫主义者和妥协派则主张效仿法国, 以法国武器武装军队, 采用法兰克式的方法训练军队, 在不废除旧有军队的前提下建立新式军队; 激进派则坚持认为旧军队无法改革, 必须彻底地按照欧洲的方式训练新军。² 迈哈默德二世的改革则受到近卫兵团、封建地主和贵族的抵制, 直到他通过强硬手段清洗了反对派后, 才得以加速组织新军的速度。与之对比, 普鲁士的精英则相对团结, 新精英的力量占据绝对优势。尽管有些贵族对改革消极抵制, 在改革者内部也存在不同观点, 例如, 施泰因和哈登伯格两人对中央集权和经济政策的观点针锋相对, 但不妨碍他们共同致力于政府改革。”沙恩霍斯特、施泰因、格耐森瑙和克劳塞维茨等精英富有远见卓识, 彼此之间关系融洽, 并且受到国王和民众的支持, 在政府中官居高位。上层改革派精英通过开放军官阶层, 获得了年轻军官的大力支持, 在教育上的改革和创新也为培养新精英创造了基础。这一系列措施使得内外交困的普鲁士国内非常团结, 凝聚力空前强大。

在国家制度能力上, 奥斯曼帝国国家制度相较普鲁士, 其能力相对低下。首先, 在制度的规范能力上, 奥斯曼帝国现代政治制度发展极不成熟。塞利姆三世和迈哈默德二世都谋求通过学习新制度来复活旧秩序, 然而, 社会结构的变迁要求政府肩负规范

¹ Allan Mitchell / - A Situation of Inferiority: French Military Reorganization after the Defeat of 1870.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86 No 1, 1981, p 49.

² [英]伯纳德·刘易斯: 5 现代土耳其的兴起 6, 第 64-65 页。

» Martin Kitchen, *A History of Modern Germany, 1800-2000*, Malden Wiley-Blackwell 2006 p 15.

性功能,中央集权也需要建立新的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新的政治体系更需要招纳经过特殊训练的人员来实现其政治功能。¹苏丹的本意是通过现代学校培养新式精英以支持自己的改革大业,但结果是这些新社会集团并没有效忠于苏丹。²其次,在制度的汲取能力上,奥斯曼帝国的中央地方关系混乱。有学者就指出,奥斯曼政府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很多省的官员拒绝服从苏丹的领导,小规模叛乱和深层次的经济衰落侵蚀着政府供养军队的能力。³地方官员和贵族控制着经济、军事等重要权力,威胁着中央政府的统治。由于外部战争不断,奥斯曼政府的财政危机使得中央政府更加依赖控制各省财富的官员和贵族,因而贵族轻而易举地获得更加稳固的政治权力。⁴从以上可以看出,军事和政治改革是一项浩大的社会工程,不能一蹴而就,而且在国家能力不强的前提下,新制度的建立往往会冲击旧制度而引起危机。

普鲁士的国家制度能力则相对较强。普鲁士在改革时实行的是/双轨0的策略,即政治改革和军事改革同时进行。施泰因和哈登伯格负责政治改革,而沙恩霍斯特和格耐森瑙负责军事改革。这些精英大多认为,强大的政府是保证自由的基本,所以主张增强中央政府的权威。⁵在改革中,普鲁士政府还积极学习法国在大革命中鼓吹和运用民族主义唤醒整个民族的做法。普鲁士教育改革的目的在于人文上的启蒙,更重要的是在于/国家的现实需要0,大部分改革者都抱有通过初级教育唤醒国民/休眠的力量0的愿望。⁶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普鲁士社会结构发生变迁,资源提取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政策执行能力逐渐增强,1840年后公共财政支出大为提高,成为支撑国家工业化的重要措施。⁷在普鲁士军事改组委员会看来,军队被看做是国家中的

¹ Kemal H. Karpat /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Ottoman State, 1789 - 1908 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3 No 3, 1972, p 252.

² Fatma M ge Gêôek, Rise of the Bourgeoisie, Demise of Empire: Ottoman Western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5.

³ David Nicolle, Armies of the Ottoman Empire, 1775 - 1820 (Men-at-arms 314), London: Osprey Publishing, 1998, p. 4.

⁴ Linda T. Darling / Public Finances: The Role of the Ottoman Centre 0 in Suraiya N. Farouji,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urkey Volume 3: The Later Ottoman Empire, 1603-183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30.

⁵ Eli Nathans, The Politics of Citizenship in Germany: Ethnicity, Utility and Nationalism, Oxford and New York: Berg Publishers, 2004, chapter 2.

⁶ David Blackbour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A History of Germany, 1780-1918, pp. 83-84. 对民族主义影响普鲁士政治变迁的探讨也可参见 Matthew Leverger, Enlightened Nation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ussian Political Culture, 1906-1848,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⁷ Richard Tilly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ublic Finance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Prussia, 1815-1866, 0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26, No 4, 1966, pp. 484-497.

国家, 尽管有时被其他阶层讨厌和轻视, 但它应该是公民所有精神和身体力量的统一。¹ 所以, 普鲁士在改革国家制度的同时, 完成了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 与这一过程相伴的是制度能力的极大增强。国家军事改革产生的政治影响力有力地推动了政治改革的步伐, 而政治改革提升了国家制度能力, 又反过来为军事改革的继续提供了保证, 这是普鲁士军事效仿的成效好于奥斯曼的重要原因。

四 结论

军事效仿作为历史上持续出现的社会运动, 影响其进程的因素多种多样。自从民族国家形成以来, 国家之间的竞争将这种社会运动系统化。持续的军事竞争、技术创新和制度演进促使国家之间互相效仿。从根本上来说, 以军事效仿为代表的学习行为已成为人类社会演进的重要动力。一个国家若想在竞争激烈的国际体系中应对自如, 必须积极学习他国的优点, 及时改进军事技术、军事制度和军事理念, 防止受制于人, 以自强自立于世界。正是基于此, 本文讨论国家的军事效仿行为, 探讨新精英集团、国家制度能力与军事效仿行为的关系。

对这一问题的解答需要注重研究国内精英集团和国家制度, 重新思考这一维度对国家军事效仿的影响。笔者认为, 军事效仿的原因不仅仅取决于一国在体系中的外部安全压力, 也取决于国内统治的压力。军事效仿的规模、速度和程度与一个国家精英集团和国家制度能力的特性密切相关: 一国内部新精英集团力量、凝聚力越大, 其军事效仿的规模、速度和程度越强; 国家制度的规范能力和汲取能力越强, 军事效仿的规模、速度和程度越大。从根本上来说, 国家效仿必须有卓越的领导人和强大的国家制度来保证, 这也给我们很多现实启示。当前世界技术进步飞速, 军事创新层出不穷, 如何及时学习他国的新技术、新制度和新理念, 已经成为各国角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单极体系下, 美国掌握着军事创新的主动权, 其他国家大多亦步亦趋追随其后。单极体系下国家的效仿机制与以往有何不同? 其他国家如何效仿以应对霸权国的安全压力? 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收稿日期: 2010 2 03 2 22]

[修回日期: 2010 2 08 2 04]

[责任编辑: 赵远良]

¹ Thomas Hippler, *Citizens, Soldiers and National Armies: Military Service in France and Germany, 1789 - 1830*, p 168

diffuse more broadly.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norms persuasion strategy norm diffusion

=Author> Huang Chao, Assistant Researcher of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y in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ostdoctoral

New Elite Group Institutional Capacity and the State's Military Emulation Behavior

Zuo Xiyong (88)

=Abstract> As a continuous social movement in history a state's learning behavior especially military emulation, is an important dynamic for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ociety.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a state carries out the military emulation strategy not only because of its external security pressur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s but also because of its internal governance crisis. The speed and scale of military emulation are closely related with a state's new elite group and its institutional capacity. The stronger the new elite group and institutional capacity the faster and broader the state's military emulation. Therefore both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a state's military emulation must be ensured by critical prerequisites of outstanding leaders and powerful institutional capacity.

=Key Words> military emulation external threats new elite group institution capacity

=Author> Zuo Xiyong Ph.D.,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cept and Alliance

Zhang Jingquan (109)

=Abstract> Concept has played a certain role in alliance formation, namely it provides feasibility anticipation for reaching an agreement and a credibility anticipation for the fulfillment of commitment. However, its function is exaggera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perception and rhetoric of statesmen and foreign policies based on them. The Concept can function better with the rationality of alliance maintenance, the long-term of alliance maintenance and the exertion of alliance soft power. Meanwhile, there is mutual construction between conception and alliance. Concept debates the rationality of alliance maintenance while the long-term maintenance of alliance pro-